

西南岩溶山区生态危机与反贫困的 可持续发展文化反思

李阳兵, 王世杰, 容 丽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贵州 贵阳 550002)

摘要:西南岩溶山区生态环境退化严重、贫困人口集中。文章探讨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在岩溶山区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力图寻找岩溶山区生态恶化和贫困的深层次原因, 指出岩溶山区存在的山地文化封闭性和典型的贫困文化特性及不合理的现代性转换导致区域生态恶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滞后。岩溶山区应通过生态恢复模式示范建设、开展参与式社区资源管理、改善居民聚居点环境来实现文化创新和文化整合, 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深层次互动与接纳, 拓宽现代性生长的内在精神空间, 变外源性的“输血”机制为内源性的“造血”机制, 从而使岩溶山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岩溶山地; 山地文化; 生态重建;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04)02-0157-06

西南地区岩溶总面积 $42.62 \times 10^4 \text{ km}^2$, 其中又以黔、滇、桂三省(区)最为集中, 其裸露和覆盖的喀斯特面积达 $32.06 \times 10^4 \text{ km}^2$, 占三省(区)土地总面积的 39.71%^[1]。该区域总人口超过 1 亿, 居住着 48 个少数民族的 2 000 万人口, 是中国南方的主要贫困地区, 全国近 1/2 的贫困人口集中于本区。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土地石漠化问题日益严峻, 贵州中度以上石漠化面积占到全省 7.66%, 石漠化程度已经相当高; 广西石漠化加重的趋势仍未得到改变, 石漠化仍以每年 3%~6% 的速度在发展; 再加上云南省, 中国西南岩溶山区平均石漠化面积约为 $2500 \text{ km}^2/\text{a}$, 与西北地区沙漠的扩展速度相差无几, 生态退化问题严重制约着该区持续发展。对西南岩溶山区生态环境退化和可持续发展做了较多探讨^[2-6], 本文探讨民族传统文化观念在岩溶山区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力图寻找岩溶山区生态恶化和贫困的深层次原因, 实现山区人口与环境的良性互动^[7], 为多元民族文化下的岩溶山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8]。

1 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1.1 文化的内涵

文化在广义上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

过程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9]”, 这一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 在结构层次上可分为最深层的心态文化或精神文化, 中层的制度文化, 表层的行为文化。区域文化观念主要指积淀在特定地域的人们意识、心理中的自觉和不自觉的某种特质和性格^[10,11], 其价值与意义在于它成为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 千百年来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情感、行为活动一直起着制约作用, 并由意识进入无意识, 形成思维方式、价值取向, 影响行为活动、情感思想, 表现于风俗习惯、生活关系等, 区域文化观念因素, 因其经济效应难以量化而表现出来模糊性、作用机制具有隐蔽性, 在经济发展中, 易为人所轻视、忽视。区域文化观念在影响区域发展主体的同时, 以区域发展主体为载体和中介, 影响区域活性、区域发展模式 and 区域综合力, 参与区域经济循环, 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1.2 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本身是一种新的文化理念, 其本质是人的素质的发展, 是以文化为重要精神动力的, 也就是说, 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文化观念的创新, 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源泉。自然的危机、生态的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人的生存发展的危机, 说到底传统的文化观念的危机, 因必须在

收稿日期: 2003-04-15; 修订日期: 2003-08-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9833002 和 90202003) 与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项目(KZCX2-105) 和人才基金“西部之光”资助。

作者简介: 李阳兵(1968-), 男, 重庆潼南人, 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与生态环境治理。E-mail: li-yapin@sohu.com

文化观念上进行批判、反思、预见,同时进行建构,实现创新,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全新的科学文化理念。

2 岩溶山区地域文化传统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2.1 西南岩溶山区地理环境特征

西南岩溶山区主要分布在以贵州为中心的滇黔桂川渝湘鄂省(市、区)。从总体地势上看,全区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步升高,总体上可分为三个台面和两个过渡地带,具有显著的地域分异规律。滇东片区,包括滇东北中山峡谷岩溶和滇东南峰丛山地,为云南高原向贵州山原过渡的斜坡地带,黔西北为岩溶高原山地,黔中常由岩溶剥夷面和溶蚀浅盆地组成,地势较平坦,耕地广布;黔北、黔东、黔南及其与四川、重庆、湖南、广西等过渡的斜坡地带以峰丛连绵的山地峡谷和峰丛洼地为主。大体上可分为相对和缓的溶原峰林峰丛型、裸露的岩溶中低山和丘陵、岩溶深切峡谷三种地貌类型,以后二者人地关系最为紧张,是典型的脆弱生态区,为亟待治理的国土单元。

岩溶山区是由强烈的岩溶作用形成的特殊的基底性脆弱地质生态环境,处于山地平原过渡带,形成一系列生态界面。特殊的水文地质条件(双层水文地质结构、陡峻地貌、土层浅薄贮水能力低)导致雨水、地表水、地下水转化迅速,形成湿润气候条件下的干旱-岩溶性干旱。生态环境以旱涝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石漠化扩展、地面塌陷、生物多样性受限制、生产量低、人民生活困难为特征,岩溶地区已被视为和沙漠边缘一样的脆弱环境。西南岩溶山区位于长江和珠江上游的分水岭地带,其生态环境功能地位与严重退化的生态现状极不相称,面临着贫困与生态退化恶性循环、生态建设与脱贫和跨越发展的矛盾。

2.2 岩溶山区地域文化特性

1) 山地文化的封闭性。所谓封闭性,指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形成社会上的封闭性、经济上的封闭性、文化上的封闭性,思想意识的封闭性。恶劣的自然条件,加上历史、社会、经济诸因素的影响,使西南岩溶山区长期处于十分封闭的环境中,外界的文化、技术、信息难以进入,导致社会封闭保守,发展缓慢,尤以峰丛深洼地和峰丛峡谷的封闭性为甚,形成典型的山地文化特性,贫困人口有向

峰丛洼地区集中的趋势。在封闭的人地关系背景下,人们视野狭窄、思路局限、现代商品经济意识差,文化、教育、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受外界影响较小、开放度低、社会进程迟缓,原始的自给自足型小农经济占优势。受封闭性影响,有的少数民族山区传统观念浓厚,文化排他性强^[12]。中国历来有“故土难离”的传统观念,尤其是深山区里居住的少数民族群众,习惯于在封闭、半封闭的环境中生存,传统的观念和生活动俗阻碍异地开发的落实,外界的信息很难进入深山村落,一般的通讯通邮条件都差,没有电视,山区的文化教育落后,构成了封闭式的民族文化圈,居住在深山的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轻易不愿出山到“别人的地盘生活”。

2) 典型的贫困文化特性。岩溶山区封闭的山地文化特性又导致了典型的贫困文化特性。所谓“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主要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13]。具体表现在:(1) 僵化的思维方式,遮蔽了贫困者的视野,制约贫困人口的行为方式;从消极方面理解党的民族政策、扶贫政策,形成依赖性。声称“靠民族政策吃饭”、“靠扶贫政策吃饭”,甘当“贫困县”,以伸手要钱、要粮为职责、为政绩。(2) 陈旧的价值观念,禁锢了贫困者的精神,不利于产生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竞争意识不强,小富即安,甚至安守贫穷,能将就而不讲究。生活观念上,重传统、重经验、节奏慢、期望值低,如生育观念、消费观念、商品观念、投资观念、迷信观念、外出观念、信息观念等都落后陈旧。农民观念落后是农村持续贫困的根源之一。(3) 长期低水平的物质生产适应了简单的文化形态,造成超稳定形态的文化结构和“内循环”的文化发展,使文化缺乏创新机制和富于发展变化的内在活力与动力。

这就是说,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价值观念及其生活方式以及文明开化程度,从更深层次上决定着人们是否贫困的命运。岩溶山区的区域贫困,实际上是贫困区域人的素质贫困^[14],长期的贫困所衍生、积淀的贫困文化意识成为制约岩溶山区少数民族发展的内在精神障碍。当然,岩溶山区少数民族落后的心理意识,除了传统习俗对他们的影响之外,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3) 环境资源认知观落后。岩溶山区源于传

统的饮食习惯,形成了向地要粮的思维方式,加大了土地的压力。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习惯沿袭原始的粗放耕作,滥划滥耕、铲草皮、挖树根、烧山种地等在岩溶山区经常发生。茂兰保护区内布依族居民对野生食用植物的利用保留了较为原始的方式,如常放火烧山促进蕨类生长,对森林植被恢复重建具有一定负作用。也由于目前主要是根据自身需要自给自足,区内布依族居民对食用植物的开发利用缺乏市场观念和资源可持续利用观念^[15]。社会习俗从各个方面影响其生存环境。许多民族习惯于木房居住,习惯棺葬,婚嫁家具等耗用大量木柴。受经济贫困和交通条件的限制,广大的岩溶山区以木柴为燃料,生长缓慢的岩溶灌丛植被作为薪炭林被砍划后急剧退化。在贵州花江峡谷石漠化区实地问卷调查“看到别人砍树,你的态度?”,意外地有人回答“不是砍我的树我就不管,他砍树总有他的理由。”可以认为,岩溶山区环境恶化的主观因素是资源-环境意识差(表1)。而本区人民的资源环境意识“差”,是在封闭的自然环境和封闭的社会经济环境中逐渐形成的,并与低水平的教育和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经济相联系^[16]。

4) 现代化冲击下的传统文化裂变。在市场经济和强劲的外来文化冲击下,大多数社会成员受利益驱动的影响,受脱贫致富愿望的驱使,过分地开采与掠夺土地资源,如陡坡垦殖、砍伐珍稀树种、为开采大理石不惜破坏本就缺乏的土壤,大量采集岩溶石山裸岩缝生长的仙人掌和蕨类等药用植物,大量收购岩溶石山石生植物的根系做盆景等,加速了岩溶山区石漠化的发生和发展。在贵州典型石漠化地区花江峡谷区调查发现,该区植被的减少主要发生在1963年公路修通以后。粗放的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已经不仅仅是资源环境意识差的问题,也成了岩溶山区农民追赶现代化的一种手段,但劣质土地、劣质劳动再加上劣质资本品的投入导致产出水平(收入水平)极其低下,使岩溶山区农民只能被紧紧束缚在土地生物链上,而退化的生态环境和低素质人口又有可能使现代化缺乏后劲和中断,实际上也就是西南岩溶山区没有找到和建立起符合区况民情的发展模式,在西南岩溶山区当前的生态重建和扶贫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一点。

5) 山地文化的生态性。对少数民族地区封闭性的认识评价上,自然而然地去关注于它消极方面

表1 不同民族对家乡树林、荒地的利用方式^[17]

Table 1 The utilization patterns of different nations on their home woods^[17]

民族	总人数 (人)	砍树作柴		成材后卖		绿化环境		开荒种地		开荒种树		不愿开荒	
		人数(个)	比例(%)										
苗族	258	108	42.0	57	22.1	93	35.9	124	48.1	111	42.9	23	9.0
布依	184	35	18.9	33	18.1	116	63.0	54	29.3	112	60.9	18	9.8
汉族	77	17	22.2	9	11.1	51	66.7	22	28.7	52	67.6	3	3.7

的多,挖掘利用它积极方面的就少。但岩溶山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隐含了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客观上有其积极作用,如瑶人认为森林犹如母亲的乳汁,是瑶人得以生存的唯一依托,这是他们竭力保护森林,有节制地利用森林和其它动植物资源的缘由,茂兰岩溶原始森林的存在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丰富程度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之间是密不可分的^[18]。“神山”作为岩溶地区传统信仰,是民族植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态学意义是明显的,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可观的。“神山”充分体现了山区人民朴素的系统生态观,它为生态学多个领域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19]。贵州罗甸木引乡当地并存生息繁衍的苗族、布依族和汉族各自沿不同的文化,采用不同的经济生活方式,按照不同思路去利用地表生态资

源,从而在早年能够构成一个均衡消费地表生态资源的“净土”,“干湿季节分明的岩溶山区疏林草地流动砍焚样式”——麻山样式适合当地的岩溶生态环境^[20]。

西南岩溶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类型和生态文化模式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一定的经济活动规模下的,在这种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活动规模下,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维持着一种低水平、低层次的脆弱平衡,一旦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活动规模超过了这种层次和水平,这种脆弱的平衡状态必然要被打破,生态危机的出现自然也就难以避免。少数民族的传统自然生态观必须在继承其中所包含的科学性、合理性因素的基础上,实现向现代的科学的自然生态观的转换,使新时期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真正建立在现代科

学的基础上。

2.3 对可持续发展影响

山区的独特文化背景对山区的经济结构、体制结构、经济开放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最终表现是山区经济自我发展能力低、区域经济总体水平低^[21]。西南岩溶山区生态恶化,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有其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但公平地说,传统文化的历史惰性才是更为深层的原因。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陈旧、保守、传统的文化观念和意识是阻碍生态重建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惰性力量,甚至不亚于环境的闭塞和经济的落后。该区边远的区位,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长期封闭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意识,人们自觉或不自觉以破坏环境和掠夺自然资源为代价来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使岩溶山区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导致生态破坏与经济贫困恶性循环,最终使居住环境和发展的可选择性变小,消费需求层次低,城镇化进程缓慢。以上这些社会、经济因素导致岩溶山区环境人口容量小,无力大规模地对自然过程中某些关键环节进行宏观和微观改造,促进岩溶山区脆弱生态恢复和良性循环。

3 岩溶山区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构想

3.1 传统文化转型的重要性

社会发展最深刻的内涵是人自身的发展,是人自身的现代化,而人自身的现代化最终体现为深刻的文化转型,离开了这一点,社会与经济都不可能持续发展。扶贫开发的实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必然会对从自然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下滋长起来的地域文化特性形成巨大冲击,西南岩溶山区贫困文化特性和封闭文化特性的现代转型将不可避免,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好合理的引导是十分必要的。

扶贫开发中,岩溶山区贫困地区民族传统文化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这种作用发挥的前提是其民族文化必须实现本身的转型和重塑。因此,岩溶山区民族文化的重塑,必将成为扶贫攻坚、生态恢复重建中的重要内容。贵州少数民族摆脱贫困的过程和文化变迁的关系,呈现如下发展趋势:(1) 越是早日脱离贫困的农村社区其文化变迁幅度越大,而没有摆脱贫困的民族社区其文化变迁就较小;(2) 凡是能保留民族文化精华,即使传统文化发

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民族群体能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较好地结合起来,脱离贫困后其发展前景较为光明,亦不易返贫^[22]。因此,从根本上解决西南岩溶山区的贫困问题、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经济指标、人均收入问题,而应该从重建革新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高度来解决贫困,在解决贫困的同时来重建民族传统文化,使之达到良性互动。西南岩溶山区的贫困并不仅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但是在观念方面,亦即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上,则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难免使有的民族地区外在的看得见的自然资源受到破坏,而且他们民族自己内在的精神财富也受到了损伤,比如传统的自立、自强、自信、自尊等民族精神,自己民族原有的促进性、开拓性等优秀品质丧失了许多,纯朴民风的保留与不断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23]。

3.2 生态文化建设途径

3.2.1 文化转型的实例

生存条件恶劣的岩溶环境以及少数民族落后的习俗导致了消极心理意识和不正确的人地观的形成,这种落后的传统观念是几十年、几代人逐步形成的,长期以来牢牢禁锢着人们的进取心和积极性。对于岩溶山区来说,贫困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贫困的文化意识锁定的精神上的麻木不仁。罗甸大关村 1980 年人均收入仅为 50 元,生活用水奇缺,是有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贷款、穿衣靠救济)。“劈石造田”的“大关模式”为西南岩溶贫困地区消除贫困和土地生态重建树立了一个榜样。大关村的人们用双手上的厚茧和血汗铸就了可歌可泣的“大关精神”,这种精神坚定了罗甸人与贫困作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同时启发了罗甸人从更深层次上分析贫困问题,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做出了走出大山、黔官打工的决策,从深层次上为脱贫致富奠定了雄厚的精神基础。罗甸县县委的一位打工归来的干部说,目前来看“大关精神”的主要作用是在当时强烈地挑战了过去罗甸农村里广泛存在的“冻死不下床”的消极宿命的状态。现在的“大关精神”要提高,不仅动手,安于温饱,还要动脑,用智慧来致富。

3.2.2 生态文化建设途径

文化转型有两种模式:内在创造性转化-文化创新;外在批判性重建-文化整合^[24]。西部大开发首先必须唤起西部人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推动西部社会传统面向现代性的内在转型,实现传统性

与现代性的深层次互动与接纳,拓宽现代性生长的内在精神空间,变外源性的“输血”机制为内源性的“造血”机制,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现代化的中断。针对岩溶山区目前的社会经济情况,结合岩溶山区的生态恢复重建,生态文化建设可采取三种途径:

(1) 生态恢复示范模式辐射效应:通过示范基地的建设,推出适宜岩溶山区环境改善与恢复并能给当地带来较大实惠的扶贫项目作为突破口,走一条扶贫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道路,使当地群众的思想、心理受到较大的冲击,产生突破效应,从而逐步消除环境带给他们的负面影响。这样就能增加他们脱贫的自信心,产生改变家乡面貌的积极性,向人与自然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方向发展。使原来较为稳定的传统心理、习惯和人地系统发生变化,使人的意识水平提高,观念改变,环境的危机感增强,行为也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逐步形成新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心理意识,彻底摒弃落后的资源观、环境观和人地观。进入一个更高的稳定状态,形成意识-行为-环境-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否则,不仅扶贫得不到落实,扶贫项目无法实施,而且还会助长那种“等、靠、要”的懒惰思想,甚至会给今后的扶贫工作增加难度^[25]。探索出的机制创新主要有:能人+科技+基地+农户模式、专家独立自主示范开发模式、政府牵头综合治理开发(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公司+政府+基层政府+农民+专家五位一体开发模式。

(2) 开展参与式社区资源管理: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简称“社区资源管理”),是贫困山区农村资源管理的方法和思路,是给当地社区居民以机会或责任,管理他们自己的资源,确定他们自己的需求、目标以及做出自己的决策的过程。能有效地协助受教育少的村民分析自己面临的问题,寻找可行和适合于他们自身条件的解决办法,提高项目受益者自身的能力。让社区农民参与到整个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各阶段是培养和提高社区能力达到发展目标的经济、有效的途径,而且只有当妇女与男人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各种层次的有关山区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和活动,山区的发展才真正可能实现^[26]。“中国贵州山区社区自然资源管理”项目组已成功地将参与式方法应用于岩溶山区自然资源管理中,初步总结出一套适合贵州贫困山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的管理措施^[27]。

(3) 强化社会服务,改善社区环境:通过社会服务计划实施区域性物质援助,向绝对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活必需品,以迅速缓解贫困;加强山区居民聚居点建设,改造、改变原始聚落生态模式,改善居民生存环境,相应促进贫困地区社会发展结构的优化,从而改善山区社会文化发展环境。并辅之一系列区域性政策措施保证贫困人口在参与经济机会中实现收入增加,并不断激发贫困人口产生新的需要和追求,从而逐步形成一种能够使贫困人口发展自身潜能的发展模式。

4 结 语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实力差、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科技落后、劳动力素质低等方面,而更重要的是在思想观念上的陈旧保守和经济组织形式、经济运行机制和由此而产生的经济环境和人们的行为等一系列深层次上的差距。西南岩溶山区的地域文化特征对山区经济发展和生态恢复重建有重要影响,改变其山地文化属性和贫困文化特性及其形成基础,实现文化转型和重塑,是西南岩溶山区生态恢复和脱贫的根本策略和重要途径。因此,在西南岩溶山区的生态恢复重建和反贫困工作中,应该从更高层次上来认识西南岩溶山区生态退化和贫困问题的本质原因。

参考文献:

- [1] 袁道先. 中国岩溶学[M]. 北京:地质出版社,1993.
- [2]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 西南岩溶石山地区持续发展与科技脱贫咨询建议[J]. 地球科学进展,1995,10(2):113~115.
- [3] 董恒秋,赵丛礼. 岩溶区域消除贫困的实践效应与策略思路[J]. 农业经济问题,1996,7:29~32.
- [4] 蔡运龙. 退化土地的生态重建:社会工程途径[J]. 地理科学,1999,19(3):198~204.
- [5] 苏维词. 中国西南岩溶山区石漠化的现状成因及治理的优化模式[J]. 水土保持学报,2002,16(2):29~32,79.
- [6] 李 彬. 中国南方岩溶区环境脆弱性及其经济发展滞后原因浅析[J]. 中国岩溶,1995,14(3):209~215.
- [7] 陈 勇,陈国阶,王益谦. 山区人口与环境互动关系的初步研究[J]. 地理科学,2002,22(3):282~287.
- [8] 张佩芳,徐 旌,周贵荣. 滇南山区多元民族文化下的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J]. 人文地理,2001,16(1):71~74.
- [9] 夏征农(主编). 辞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1588.
- [10] 孟召宜. 文化观念与区域可持续发展[J]. 人文地理,2002,17(2):74~77.

- [11] 张仁慧. 论地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地域模式[J].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1998, 14(2): 26 ~ 31.
- [12] 安裕伦. 贵州峰丛喀斯特多民族山区人地关系的思考——以贵州麻山、瑶山及北盘江河谷地区为例[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0, 18(3): 8 ~ 12, 51.
- [13] 王世杰, 张殿发. 反贫困系统工程[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
- [14] 彭贤伟, 熊康宁. 贵州紫云县区域贫困及其形成原因分析[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1998, 16(3): 59 ~ 63.
- [15] 陈正仁, 蒋忠诚, 余登利, 等. 茂兰布依族传统食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研究[A]. 朱守谦(主编). 喀斯特森林生态研究[C]. 贵阳: 贵州科技出版社, 2003.
- [16] 陈慧琳. 贵州麻山地区居民的资源环境意识模糊综合评价[J]. 地理科学, 1998, 18(4): 379 ~ 386.
- [17] 熊康宁, 黎平, 周忠发, 等. 喀斯特石漠化的遥感 - GIS 典型研究——以贵州省为例[M].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02.
- [18] 陈正仁, 余登利. 瑶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A]. 朱守谦(主编). 喀斯特森林生态研究[C]. 贵阳: 贵州科技出版社, 2003.
- [19] 李先琨, 苏宗明. 广西岩溶地区“神山”的社会生态经济效益[J]. 植物资源与环境, 1995, 4(3): 38 ~ 44.
- [20] 吴正彪. 多元文化构件在生态均衡中的实践价值——以贵州省罗甸县木引乡的苗族、布依族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利用方式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01, 21(3): 52 ~ 56.
- [21] 陈 钊. 山地文化特性及其对山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 山地学报, 1999, 17(2): 179 ~ 182.
- [22] 张国安. 贵州反贫困的历程与文化变迁[J]. 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 (3): 5 ~ 8.
- [23] 姚顺增. 对封闭状态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反思[J].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19(1): 69 ~ 71.
- [24] 衣俊卿. 论文化转型的机制和途径[J]. 云南社会科学, 2002, (5): 53 ~ 58.
- [25] 容 丽. 贵州生存环境恶劣的喀斯特地区移民意愿与扶贫思考——以紫云麻山地区为例[J]. 中国岩溶, 1999, 18(2): 190 ~ 196.
- [26] Susanne Wymann Von Dach. Integrated mountain development: a question of gender mainstreaming[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2, 22(3): 236 ~ 239.
- [27] 周丕东. 贵州山区村级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参与性研究[J]. 贵州农业科学, 2001, 29(1): 36 ~ 40.

Reflection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Ecological Crisis and Anti-poverty in Karst Mountain 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LI Yang-Bing, WANG Shi-Jie, RONG Li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Geochemistry, Geochemistry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iyang, Guizhou 550002)

Abstract: The eco-environment of the karst mountain area in Southwest China has been degraded seriously and is one of the largest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China.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influence of nation tradition culture ideas on society process and economy activities in karst mountains in order to search the profundity reason for eco-environment degradation and nation poverty.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occlusive mountainous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typical poverty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irrational modernity diversion result in regional eco-environment degradation and the lag of socie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karst mountains. Ecological rehabili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model, community-based participatory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amelioration of community environment should be the approaches to realize culture changes including culture innovation and culture conformity, make tradition culture and modern culture assimilate each other in a deepen administrative levels in karst mountains, develop inherence spirit space of modernity, turn outer "blood transfusion" into endogenesis "blood making", accordingly, realiz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karst mountains in Southwest China.

Key words: karst mountain areas; mountain culture characteristic;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